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
谱写新时代新篇章

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使命

□张知干

新的文学使命,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文化担当。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文艺发展任重道远,文艺繁荣正当其时。欣逢伟大时代,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敏锐感受时代脉动,深刻把握国运变化,始终挺立时代潮头,努力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书写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辉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而开启了中国特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艺。新的历史方位,必然给文学事业发展提出新任务新要求。准确把握新时代的文学使命,这不仅是事关文学事业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也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兴盛的关键所在。在新时代,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变革、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事业的新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必须随时代而前行、与时代同频共振,找准定位,把握方向,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强烈的自信心,切实担负起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层面,新时代文学必须肩负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的新的历史使命

“文变染世情,兴废系时序”。文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始终同国运相牵、同国脉相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一论断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鲜明地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的重大光荣使命,从而将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也为新时代文学事业发展指明了新的努力方向。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而其中文艺作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始终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先导和引领作用。文艺繁荣与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始终紧密相联、相互促进,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通过人们的感情与思想的变化、进而对现实产生影响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使人们“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由此可见,文艺在展现时代精神、引领时代发展、推动时代进步上,始终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雄辩地证明,文艺繁荣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文艺作品在警醒世人、烛照未来方面,每每起到“早行人”的关键作用。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学华彩篇章,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以其强大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源泉,始终激励着人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不断前行,推动着中国历史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文艺对社会品格的塑造、民族精神的提升、共同理想的形成始终发挥着滋养和支撑作用,始终与民族的发展进步保持紧密联系。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文艺复兴。越是曙光在前,越是梦想可期,越是要秉承一以贯之的民族之魂,越需要发挥文艺塑造铸魂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文艺是时代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格、最能激励一个时代的精神。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发扬我国文艺历来关注现实、关怀人民、关切国家前途命运的优良传统,自觉将“文学梦”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中,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切实担负起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神圣职责。要充分发挥文艺的精神引领作用,用更多的优秀作品,给人们以

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指引,激发人民为实现美好理想、过上美好生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充分发挥文艺的精神支撑作用,用优秀的文艺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和集体意志,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精神骨架;要充分发挥文艺的滋养作用,用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总之,在新时代,我们要通过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充分发挥文艺凝聚人心、开启新风、引领方向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民族凝魂聚气、为时代凝心聚力,凝聚起13亿人民的磅礴力量,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从服务人民的宗旨层面,新时代文学必须肩负起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新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必然给我们的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只是物质文明方面的需要,也包括精神文明等方面的需要,其中必然包含了对文学艺术的更高、更新、更迫切要求。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变化,广大文学工作者必须认识社会基本矛盾的新变化,顺应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把握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聚焦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肩负起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的文化使命。

从根本上来讲,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这是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时代体现。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宗旨,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初心和本真,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底色。列宁曾经指出文艺“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提出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要求“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的灵魂始终未变。一直以来,我们的文艺始终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作为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不断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中不断实现自我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动力和基本原则,紧紧把握时代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变化,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新时代文艺工作的根本追求和努力方向。

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需要,这是我国社会进步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提出的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当前,我国已经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小康既是物质文明的小康,也是精

神文明的小康,二者互为支撑、彼此促进。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进入消费结构提升、文化消费活跃的新阶段,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求知、求乐、求真、求美、求美的愿望日益迫切,对文化需求、精神享受、情感熏陶、艺术生活的品质不断提升,这无疑给新时代文艺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推动生活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我们要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没有精神文化生活的充实,幸福人生和美好生活都无法圆满。面对新时代、新变化,紧紧围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努力创作和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食粮,满足人民对文化生活的更高要求,成为时代发展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要求和奋斗目标。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所系。文艺与人民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是一根永远剪不断的情感脐带、文化脐带和历史脐带。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一切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人民通过劳动创造的。人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显然,在物质生活需要基础上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精神文化产生的基础,当然也是文学艺术产生的基础。列宁强调:“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习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这一论断,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准则。人民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最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文艺只有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始终奉行的最高准则,才能获得无穷的活力、开辟广阔的前途,文艺事业才能欣欣向荣。反之,文艺如果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和基本要求,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则会失去持续发展的根基与活力。因此,在新时代,是否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不仅是事关文艺宗旨的实现问题,也是事关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前途命运问题。新时代的文艺,必须认识新矛盾、顺应新趋势,紧紧把握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价值取向,以更加自觉的姿态,投身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在人民的创造中进行文艺的创造,在历史的进步中造就艺术家的进步,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全面发展,不断促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繁荣文学事业的自身发展层面,新时代文学必须肩负起筑就新时代文艺高峰、开辟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兴盛新局面的新的历史使命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盛世兴文。当前,我

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开创文艺繁荣发展新局面,也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同时也为新时代文艺发展提出了伟大的奋斗目标和新的历史使命。

回顾中国文艺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进步与文艺繁荣发展始终保持同频共振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轨迹。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我国的文艺一直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前行。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均在历史的各阶段都开创了文艺的高峰,无数的灿烂篇章所展示出的独特文化魅力,成为每个时代最耀眼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文艺高歌猛进,也出现了一波波高潮,在充分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风采的同时,也在不断地传承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延续着中华文艺不断繁荣发展的文化基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工作者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使命。当今,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呼唤光辉灿烂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作为民族文化的建设者、时代精神的塑造者,必须感国运之变化、民族之复兴,秉持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学自信,肩负历史使命,以新的更大的作为,再造中国文艺新的时代高峰。

对于广大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来讲,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既是中华文艺光荣传统的传承,也是时代的要求和急切呼唤,同时也具有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和重大的历史机遇。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的文艺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文学工作的重要地位空前、文学创作的活力空前,我国正迎来文艺事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这为铸就新的文艺高峰提供了强劲动力。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发展步伐之快前所未有,社会生活的丰富前所未有,这必然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特别是创作出伟大的文艺作品提供丰厚的创新土壤和艺术源泉。

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关键是要创作生产一大批文学精品力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诚然,历史上每个时代形成的文艺高峰,最根本的标志还是有一大批优秀作品的呈现。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优秀的文艺作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造能力,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发展水平,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认知和精神想象力的最新成果。因此,从文艺中可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民族的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创造水平。在新时代,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志存高远,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努力创作出反映时代文明的精品力作,打造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经典文学作品。特别是要始终秉持为民族写史、为时代立传、为人民放歌的理念与追求,积极投身时代大舞台,敏锐观察和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推出一大批反映伟大时代变迁的重大现实题材大作力作,铸就新的文艺高峰。

总之,新的文学使命,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在文化上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文艺进行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文化担当。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文艺发展任重道远,文艺繁荣正当其时。欣逢伟大时代,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敏锐感受时代脉动,深刻把握国运变化,始终挺立时代潮头,努力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书写社会主义文艺的新辉煌。

「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

——文章写作的有心与无心

□庄锡华

“非为作文,文思自来”,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状态,这是部分文坛前辈的经验。写文章为文造情,苦思冥想,费尽心计,却不容易写出好的文章;反倒是凭着自然来袭的文思,辅之以润色、提炼,往往会有出色的发挥,写出来的文章能够打动人。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产生这种尴尬情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苏轼《南行前集叙》称:“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不能自己而作”,“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话说得很直接:文章不是要写就能写的,而是由某种生活事象触动了文思,率而命笔、欲罢不能。苏洵多次说到这层意思,他曾以风水相激来形容写作的动因,认为写文章应当是自然而然的行。《仲兄字文甫说》认为好的文章应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一正一反,说的都是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意思。写作是因为强烈的情绪驱动,有感而发,并非存心作文。陆机《文赋》探讨写作驱动力时说:“伫中区以宏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文思之来:一感于物,一本于学,又以“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来形容文思之来难以预料、不宜操控的特性。文学史上那些感人至深的名篇,像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大多是临事后作者不能不有的表达,而其内容不过是作者积累胸中、感受极深的思绪。

“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是苏轼一生的秉持,他的不少文章率性自然,绝无斧凿之痕。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他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时也说写文章应如“行云流

水”,有感而发,兴来而发,兴尽而止,来得半点勉强。并非有意写文章,就能写文章;更不是有意写文章,就能写出好文章。而文思泉涌,兴会淋漓,只需尽情挥洒,这样的写作境界谁不欲羨?苏轼集中如《赤壁赋》这样的随笔小品,大多是触景生情,胸中块垒必欲一吐为快。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于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被人说成是“神来之笔”,其实都发自作者的内心,是其平日反复品味人生时的感喟。

明人方苞《杨千木文稿序》说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写文章的积极性愈高,写出来的文章愈是低劣,愿望与效果大相径庭,问题出在哪里呢?文苞认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言有物”,触物生情。情动于中,有感而发,才可能成为上品文章。为文造情,“质衰而文必敝”。桐城被时人称为天下文章的渊藪。从好的方面说,大多与作者有话要说、言之有物相关。方苞的小品文章便颇有可观。但桐城派得名之后,以文章高自标,提出了义法的要求,对文字布局、遣词造句有太多的考量,写文章的规矩越来越严格,刻意于文的印痕也愈益明显。束缚一多,失了自然的真趣,其末流不免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竭力要扫除的文化垃圾,早没了昔日的辉煌。

根据阅读经验:朴实、素雅鲜有厌者,相反,光昌流利读得多了,却往往让人腻烦。文章“做”的成分愈多真情实感便愈少,就难以打动人。文学史上韩愈是刻意于文的代表,“文起八代之衰”,写文章很自觉,赵翼说韩愈有心学杜,偏于奇险,“然奇险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得,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少了杜甫的自然,多了刻意于文的心计,所加雕琢必多,这一少一多,较量得失岂可以道里计?周作人说韩文搔

首弄姿,装腔作势,是典型的“策士之文”。上世纪60年代,文坛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崇尚宏大叙事,气魄、胆量确实很大,但缺失了真实性、趣味性的要求,无中生有、编出来的文章充斥文坛,这样的文章用郑莹的话来说就是“不待人烧,彼将自烧”。

客观地讲,写文章有意为之,作文之意强旺,与中国传统文化夸大文章功用的价值评估不无关系,写文章遂成为许多读书人眼中的名山事业,孜孜矻矻,或明或暗都存着青史留名的一份心思。苏轼论文,“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摒弃功利意识,彰显的是一种新的作文境界,其用意与欧阳修“言不可恃”,似乎都是对着那种将著作看作立言不朽的态度唱对台戏的。其积极的方面就是抛弃了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恶习。

文思因感而生,乘兴而作,兴尽而止,但进入写作状态后需要更多地调动生活与知识的积累,这就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探讨文章写作的无心与有心,似应将文思来积后,作者调动起写作热情,运用才情、素养、知识积累,使胸宇中的感触形诸文字,复杂情况考虑在内。像明代袁宏道、唐顺之那样为了反对复古模拟,忽略作者主体因素对文章的影响,一味肯定贩夫野老未经审美加工的发声,断言写作是情感驱动的下意识行为是不对的。文思袭来后作者会有一系列积极的思维活动,生活积累、知识积累的有效参与可以使文思的建构更加丰满充实,形诸文字时还有孰先孰后的安排,同样的文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词、文句的选择都需要作者认真的思考。

诗文同源,我们以诗歌文字的选择与组合为例。王安石的“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常为人称道,词语的搭配堪称一绝,用中国古代诗评家的眼光看,那叫险对,这样的险对岂能没有巧思?王诗有关暮春的描述写得多创新。落英缤纷是自然现

象,“细数”,就融入了人的活动,而当“细数落花”与花下“坐久”组合之后,审美的内涵获得了极大的彰显。细数与缓寻、坐久与归迟,语词搭配堪称精妙,得力于诗人的巧思。同一自然现象还曾出现在杜甫的诗中,“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诗伤春,但别有会心,风飘万点,纷纷扬扬的落花构成一种独特的自然意象,杜诗选词炼句,仿佛随处都能有神来之笔,让人难以企及。由此可见,生活中有了感触,产生了表达的欲望,还需具有表达技巧,文思的蕴酿、提炼,结构的安排、修辞造句,都需要作者的殚精竭虑。苏轼《范增论》属于史论小品,篇幅短小,内容却极为丰富,文章中作者充满心机的安排不难把握。赞范增弃羽,这有前人的言说,而恨其去之不早则发人之未发;称项羽不杀沛公“有君人之度”,又责其弑义帝为不智,君人之度与小人的不智,两两相对,突现了人物性格的分裂。继以“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将文意向更深层次拓展。苏轼是绝顶聪明的古人,欣赏自然而然的写作状态时岂能不顾文章需要作者不断完善构思、行文时要有独特的安排这一常识性的道理?事实上他在著述中经常有关于文章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探讨。《东坡志林》复述欧阳修的写作经验,说是要多读书、多写,从中揣摩、提升写作经验;《与谢民师书》讲文章要写得如行云流水,这些都是基于作者对于写作的理性思考。

总起来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于文章心理动因的这一说法,在古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肯定作文受情感驱遣、摒弃为文造情,并不否认写作中应有主体的自觉,好的文章应是有心与无心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很能理解各地为作家举办各种学习班,致力提升作家的知识积累,促进其写作水平提高的意义。